

2009 Mian
Zhong Dian Xiaoshuo
Jing Xuan

文本分析版

中
篇
小
说
精
选

2009年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藏策 选评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2009年中篇小说精选(文本分析版)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藏 策 选评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9 年中篇小说精选:文本分析版/中国小说学会主编;
藏策选评.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1

ISBN 978-7-201-06453-6

I. ①2... II. ①中... ②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2103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2.625 印张

字数:280 千字

定 价:24.80 元

代序：叙事，走向真正的“个人”

——《2009 年中篇小说精选》序言

年度小说精选编到 2009 年，新世纪也已经快走到第十个年头了，回首望去，舒缓而平静。除了所谓的“底层叙事”曾小打小闹地热了一下之外，再无什么思潮、群体、派别之类的集体亮相了。所有的实验都已经实验过了，所有的“主义”也都“主义”过了，小说仿佛一下子就步入了中老年，对一切先锋的诱惑都失去了兴趣……作家们也都各自闷下头去写各自的东西，虽然写得出类拔萃的并不多。80 后作家被商业炒作裹胁着“热”了一阵之后，真的作起小说来，才发现年龄其实与小说的关系并不大，作家比的是才华和底蕴，而不是比谁更年轻。

细数新世纪以来的中篇小说，总体上是不如 20 世纪 90 年代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比如作家的分流——有的过了创作旺盛期，有的写电视剧去了，有的做了官……更有理论批评家的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理论和批评，虽然并不能真的去“指导创作”，却是文学写作中必不可少的催化剂和清新剂，是应与创作实践形成相互启迪的良性互动的。尤其是自 20 世纪以来，理论与创作大都结伴而行，比如精神分析理论与心理小说，结构主义与实验小说，后结构主义与“元小说”，新历史主义与历史叙事的转变等等。然而新世纪以来的理论批评，反不如 20 世纪 90 年代活跃，

代序：叙事，走向真正的『个人』



而且文学界与学术界出现了话语上的割裂,学术界基本照办西方理论而远离中国实践,文学界则仍停留在老掉牙的“反映论”的土围里转圈圈……在这样的理论“荒原”里,批评矮化为类似于西方媒体的专栏评论,而且还是掺了水的,不是毫无原则一味夸奖的“友情批评”,就是专为吸引大众眼球的“酷评”。那些多如牛毛的作品研讨会,更是越来越与批评本身无关,而成为作家的体制“待遇”和进阶“仪式”。其实,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各种文本实验纷纷上场演练之后,眼下正是进行理论的归纳、深化与创新的时候,小说的可能性永远都是无止境的。再说所谓的“现实主义”也早已经与时俱进了,一味地纠结于“反映论”的窠臼中,只能让“现实”永远都无法“主义”。杰姆逊早在1985年时就说:“在中国我有个感觉,就是现实主义成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谁也不真正就此进行讨论,只是当人们放弃了现实主义时才有人出来讲一讲。因此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得有人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研究:一方面认为现实主义只不过是视觉幻象,另一方面认为现实主义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只有不正常的作品才不是现实主义的。我们需要的是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然而二十几年都过去了,依然没有人“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

还好,中国作家的数量毕竟是极其庞大的,虽说身处理论缺氧地带,其中总不乏佼佼者,不可能全被“底层叙事”之类的口号给忽悠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在文坛曾经引领风骚的那些实力派作家,自身毕竟是有底蕴的,在新世纪自然成为了中篇小说写作的领军人物,如方方,如王安忆,如严歌苓……还有的“老”作家在新世纪里达到了自己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如越来越著名的叶广岑。叶广岑近些年来的创作,简直可以称作一种现象了——连续若干年,每年必有佳作,必以老北京的满族家族为背景,必以某

一出京剧的剧目为小说标题，她不仅不虎头蛇尾，而且后劲十足，且有越写越精彩之势。我今年已经是连续三年选她的小说了，没办法，想不选都不行。

新世纪也是所谓 70 后作家的成熟期，如魏微、乔叶、金仁顺、盛可以、鲁敏等作家的创作，当然也包括 60 后里的须一瓜、葛水平等等。无论是 60 后还是 70 后，都不乏大器晚成者，如葛水平，如阿袁，如滕肖澜，她们都是新世纪才正式进入文坛的，但起点非常之高，都是连续两年被我选评的作家。阿袁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她是张爱玲、钱钟书那一代知识分子作家文风在当代的复活，因而我评她文章的名字就叫《前世流传的因果》。也有人说阿袁写作的题材太窄，只写高校写知识分子……可真能写好高校写好知识分子的作家又有几个呢？曼斯菲尔、简·奥斯丁等作家的写作题材也都不算宽，难道她们就不算好作家？说到底还是“反映论”里那套“题材决定论”之类观念的局限！叶广岑现在的系列家族小说也可以说是题材变窄了，但小说还不是越写越好了？——“反映论”的那套陈词滥调不破，有好小说也发现不了。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作家的写作越来越个性化。或者说是新世纪以来作家中的佼佼者，越来越靠近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地，他们告别了昔日那属于集体的声音，找到了个人的话语频道。20 世纪 90 年代，文坛曾流行过所谓的“个人化写作”，然而那时的所谓“个人化”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吊诡——强调“个人”而陷入“雷同”。我在当年写的《“个人化写作”的非个人化倾向》一文中就曾说：

在 90 年代的创作中，又多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那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写作”……然而当我们“细读”这些作品后，都又不无遗憾地发现：它们还缺乏一种真正属于“个人化”的“声音”，充其





量不过是在故事内容方面的“隐私化”而已。……一种真正属于“个人化”的创作,应该不仅仅停留在述说隐私上,而且要提供“个人化”的思想资源和“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并通过一套具有“个人化”特征的符码系统,来真正传达具有“个人化”的声音……只囿于自我隐私这间独身女人的卧室里辗转,其自我重复,类别雷同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虽然有的作者才华横溢,但其作品所建构的却不是“个人”,而是一种“异类”,是“异类化”写作。我们看不出陈染的《私人生活》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有多大的不同……

90年代的所谓的“个人化”,其实是把“写个人”曲解成了“个人化”,所以虽经大力提倡,但仍行之不远。而新世纪以来的小说,虽不再强调“个人化”,但其中的佼佼者却真的开始“个人化”了。文学其实就应该是“个人化”的,一切的“宏大叙事”都是反文学的。文学是个人生命体验的外化,是经验以及梦想的个人史。时代、现实和世界,只有从个人的视角中写出来才是文学意义上的,才是可以打动心灵的。文学属于二级符号系统,文学只能指涉现实而无法复制现实。

我本年度所选的7个中篇,就很能代表作家日益“个人化”的叙述。《三岔口》是叶广岑的家族历史系列小说在2009年里的新作,她的这些小说都是非常“个人化”的,但这种“个人化”绝不再是以往的那种“写自己”,而是以个人的视角和记忆去触摸家族、社会和历史。叶广岑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个人的和家族的命运与历史变故之间的冲突和突变,看到了个人记忆中的沧海桑田。方方的小说在叙述上总是远离个人的,但她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却又是非常个人的。如她去年的《万箭穿心》,完全未按一般“底层叙事”的路子走,而是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今年的《琴断口》有些不同于她以往的风格,更多地探索了人的内心。林那北的《风火

墙》则是篇很独特的小说,还传奇性于现代叙事。滕肖澜的《倾国倾城》虽依然貌似她以往风味十足的日常琐事叙事,但故事却写得杀机四伏,一点都不“日常”。王手则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内心的敏感,于不温不火中洞察着世道人心……从这些看似波澜不惊却又迥异其趣的小说中,我看到了作家对内心的坚守,对眼睛的忠诚,看到了他们向着“个人立场”的回归。

是为序。

2009年12月24日 平安夜

代序：叙事，走向真正的『个人』



目 录

代序:叙事,走向真正的“个人”	藏 策 / 1
《三岔口》(《中国作家》2009年5期)	叶广岑 / 1
《琴断口》(《十月》2009年3期)	方 方 / 43
《汤梨的革命》(《中国作家》2009年1期)	阿 袁 / 111
《风火墙》(《北京文学》2009年8期)	林那北 / 161
《倾国倾城》(《人民文学》2009年3期)	滕肖澜 / 226
《白备车之歌》(《收获》2009年2期)	王 手 / 293
《叶小灵病史》(《北京文学》2009年9期)	乔 叶 / 338



三 岔 口

一

少年时对革命向往异常,至今尚未疲惫,不同的是多了些成熟与理性。

幼年的我成天盼着打仗,想的是若能赶上红军长征,赶上八路打日本,赶上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我一定是红军,是八路,是解放军。只可惜,生不逢时,解放军们在东北、在淮海、在平津地区浴血奋战的时候我还在穿开裆裤,没有参战的资格。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暑假学校组织读书会,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让人家在树底下围成一圈,轮流朗读。册子上说的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册子封面的刘胡兰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嘴唇紧紧地抿着,短头发被风吹得扬起,英俊而潇洒。扉页里有毛主席的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字写得比我们终日描红的字体漂亮多了,流畅而舒朗,跟刘胡兰的头发一样,高高地飞扬着。画面上刘胡兰的脖子硬硬地梗着,很长,很美。我想,敌人用铡刀把这个美丽的脖子切断了,刘胡兰一定很疼很疼,明明知道疼还在坚持,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若换了我大概不会如此镇定,至少





我不会把脖子亮得这样开,因为那是“数九寒天下大雪”的日子。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敬佩刘胡兰,认为她是天下最坚强最伟大当然也是最勇敢的女性,她是烈士,不是凡人,她离我们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特点是喜欢把我崇拜的人随时向人介绍推荐,比如花木兰,比如诸葛亮,比如孙悟空和武松,但他们都不能和刘胡兰比,因为他们都不是被敌人杀害的,刘胡兰是被“勾子军”当众杀死在村口的,临死还怒斥敌人,所以刘胡兰是我的崇拜之最。

崇拜的具体表现是将封面的刘胡兰在图画纸上临摹放大,然后拿到老七那儿去上颜色。老七是我七哥,是画家,他有这个本事。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绝,老七说这是版画,版画是要套色的,不是用颜料往画上涂的。道理说了不少,反正是不给上色。他不给上色我自己上,我上色的本事自信也不比谁差,我们家里的很多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那时候还没有“彩照”一说,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彩色照片吗,照相馆有专门上色的师傅,也卖涂抹照片的专用颜料。我曾经用那些颜料将父亲工作证上的照片涂成了蓝脸,父亲看了说他成了《西游记》里的妖怪“奔波儿霸”了。我也将穿着婚纱的老二媳妇照片做了涂抹,给新娘子涂上了红嘴唇,使新媳妇像刚吃完人肉的夜叉。那种颜料是洗不掉的,害得老二媳妇再也不跟我说话了。那天我拿着画像到母亲那儿去告老七的状,母亲看着刘胡兰的画像说,这不是你三姐吗!

我说这是刘胡兰。母亲说,我以为是三姐呢,你三姐就这个模样。

我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也是被反动派杀害的,与刘胡兰不同,不是铡死是活埋,就埋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城墙根底下。敌人没用铡刀,连子弹也省了,挖个浅坑,让人躺在里头,盖上土就完了。后来听说行刑的时候是在黎明,天将亮,非常的秘密,不像电影里

演的,周围有乡亲,还有大狼狗,他们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黑沉沉的城墙和寒冷的北风,他们也没喊口号,连点儿声息也没有,静悄悄地死了。杀了他们没几个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用书上的话说是他们“已经见到了黎明的曙光”。解放以后政府通知我们家去收尸,是母亲和老七去的,俩人回来一身土,两脚泥,眼睛通红,连厨子给熬的小米粥也没喝一口。母亲对父亲说,三丫头的尸骨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地上三排亮着几十具遗骸,都用草席盖着,鼻子眼睛烂成了黑窟窿。

后来母亲是从一只没有烂完的鞋上认出三姐的。那是一只千层底的黑布鞋,鞋上绣了一朵小梅花,是我们故去的第二个母亲的手工,三姐离家的时候穿的,走的时候跟母亲说是上西山郊游,特意脱下皮鞋换了布鞋,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烈士们的遗体由国家统一安葬了,三姐没有埋在烈士陵园,而是被父母提出,埋在了自家的坟地里,小小的一个土堆,连墓碑也没有。除了门框上挂着的“革命烈属”那块蓝地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父母亲在处理三姐的后事上相当低调,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说这钱是闺女用命换来的,花着伤心……不要。

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学们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后代”们,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不自量!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三姐叫屈,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没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

小学校的隔壁是某机关大院,同学中不乏干部子弟,他们自成圈子,玩的游戏,谈论的事情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视我们玩的“跳间”、“拽包”、“抓子儿”为不屑,称我们为“胡同串子”。“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干部子弟相提并论的,子弟们的优越感显而易见,连





老师跟他们说话也特别的轻柔,特别的小心。“胡同串子”们动辄便被班主任高玉琴“请家长”。我们的家长也很不值钱,老师一叫,赶紧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孙子一样地听训,回家对“串子们”便是一顿臭揍。老师不敢请干部子弟的家长,他们的父母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我敢说,哪一个都比校长级别高,更别说我们那个班主任高玉琴了。

有一回到北海过队日,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参加。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大官参加女儿的队日,本身有点儿怪,这事搁“胡同串子”身上是绝无可能的,甭说我们的爸爸想不起参加我们的队日,就是想起来了也不会跟着一群孩子瞎起哄,白耽误工夫。对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琴老师竟然答应了,还有点儿受宠若惊,还给校长汇报,这让我很看不起她,因为她对“子弟们”的要求从来不敢拒绝。第二天我们举着中队队旗步行到北海后门,雷小蕾的爸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雷小蕾的爸爸隔着马路向我们招手,雷小蕾自豪地说她爸爸是坐专车来的。我说我父亲过去也有专车,大马拉的专车,带丝绒座玻璃窗,是从外国进口的。雷小蕾想也没想就说,你爸爸原来是赶大车的呀!

正巧,过来一辆骡子拉的大车,车上装满煤炭,赶车的人和拉车的骡子都是眉目不清,黑头黑脑的,“子弟们”便指着车说那是我爸爸。更有多事的大声喊:是赶车的还是拉车的呀?

众人一阵哄笑。

掬尽三江水,难洗一面羞,其实都怪自己少不更事,自讨没趣。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以后,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众人中属于另类,得随时收敛着,蜷缩着,不能逞强,明明是把“全聚德”烤鸭店的师傅叫到家里做烤鸭子,也得说“压根没见过熟鸭子是什么模样”。明明老张是看门的,莫姜是做饭的,刘妈是打扫屋子的,跟同学们也要把他们说成是“院里邻居”,在性格和心灵上都

有些扭曲。这种扭曲一直延续了我的大半生，铸就了我内向、不合群的性情。就是在今天，独处时往往觉出难耐的惆怅，混迹人群，谈笑风生中，内心深处也常常泛起难堪的孤独，由不得自己，是小时候做下病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雷小蕾的爸爸穿着一身将校呢，背着一架照相机，笑眯眯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谁问雷小蕾她爸为什么没戴肩章领章武装带，雷小蕾说，大官不用戴人也知道是大官。

雷小蕾爸爸参加队日的目的是照相。他的大照相机炮筒子一样，咔嚓咔嚓在我们周围响个不停。慢慢地我便窥出了端倪，大官的相机专门对着的是他的女儿及个别干部子弟，根本没我们这些“胡同串子”什么事儿，当然我也就不必上赶着往前凑了。我自小就是敏感的，我知道我是谁。

这个队日过得心里有点儿别扭。

几天后雷小蕾把过队日的照片拿到班上来显摆，有划船的，有荡秋千的，有吃冰棍的……大家传着看。照片里，雷小蕾绝对是“女一号”，我们则是芸芸众生，是陪衬。班主任更惨，照了半张脸。就这，高玉琴老师还一个劲儿说，照得好，可以留作纪念，过五十年你们再看，有意思得很呢。

可惜，还没过十年，高玉琴就死了。

我想如若我的三姐活着，我自然也属于干部子弟了，我的三姐即便不是大官也得是个国家干部，这样我和我的那一帮芸芸众生的“胡同串子”们也不至于沦落到跟假山、大树、九龙壁一样，充当背景的地步。

三姐身后的冷寂，“胡同串子”的低贱，班主任的巴结，让我失落，在二年级小学生的心里拧成了一个结。现在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郁闷得厉害，觉得自己掉价极了，回来便跟父亲哭闹，问他怎的不当红军去长征？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人家的爸





爸都去革命了，他非要泡在家里，接二连三地生一堆孩子，简直是莫名其妙。

父亲被我纠缠不过说他也当过大官，而且是中央级别的，比雷小蕾爸爸的官大多了。我问什么官，父亲说是镇国将军。

母亲一听赶紧把我拉开，说不要听父亲胡说，那都是父亲瞎编的，并且告诉我，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万一人家较起真来，咱们可担待不了。其实父亲没有胡说，您还真是个“镇国将军”，不过这个将军不是共产党任命的，是清朝皇上封赏的，我祖父是镇国公，世袭罔替，代降一等，到了父亲这辈就成了镇国将军。我说，有这个将军比没有还让人恶心，寒碜也把人寒碜死了，我哪里会出去说！

父亲从来是不急不慢的，对我这个老闺女绝对有耐心，揪着我的小辫子说，阿玛也是当过红军的……

我眼睛一亮，扑在父亲怀里，揪着您的胡子说，真的呀？

母亲对父亲嚷嚷：越说越离谱了啊！

母亲将我从父亲的房间拉出来，带到厨房，给了我一块大糖瓜，这糖瓜本来是准备过年给灶王爷上供的，让灶王爷的嘴被糖粘上，在玉皇大帝跟前说不了坏话。现在母亲把糖瓜给了我，想的是把我的嘴也粘上，再说不了“镇国将军”一类的是非。为了解开我心里的结，母亲安慰我说，谁说咱们不是干部子弟，谁说咱家没大官，你的表兄小连那不是大官又是什么？

二

小连的确是高官。

小连的官大得让我不知道有多大。

有一回小连上我们家来，提前半小时，整条胡同都戒了严。一

会儿，三辆小车停在了门口，呼呼啦啦下来一帮人，进来的只有小连一个。

我那是第一次见小连，很普通的一个人，个子不高，白净面皮，穿着灰中山装，披着呢子大衣，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其实他是地道北京人，搁先前也属于“胡同串子”范畴，不知怎的，一当了官连说话都变了。母亲迎了出去，站在垂花门的台阶上给小连请了蹲安，客气得简直都不像我的母亲了。后来小连走了她又反思这个安请得不对，小连是晚辈，他应该管母亲叫舅妈，哪有舅妈给外甥请安的道理。说白了是母亲没见过官，甭管是谁，只要是官，自己的心里先怯了三分，这也是穷人心态。她那朝外南营房的贫民出身，让她对一切官员都有着本能的避讳和谦恭，官大一级都能压死人，更何况母亲没级，小连在她眼里就是她这辈子见到的最大的官了。依着规矩，母亲应该站在垂花门里，正屋的廊子上迎接客人，不该到二门外头去抛头露面，而且是为一个外甥，真值得！这份儿跌大了。

母亲没我端得沉稳，我站在屋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小连随母亲走上台阶。小连看到了我，摸着我的头问我是谁，小连那态势绝对是高官接见群众的亲民态势，我在新闻电影上看过，一点儿也不新鲜。母亲赶紧说，这是老闺女，小名叫丫丫，你舅舅六十岁才得了这个，宠得什么似的，没一点儿规矩。

母亲说我没规矩，我便越发地没规矩，主要是她在外人跟前说出了我的小名，这让我觉得很没面子。我对灰中山装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小连，你哥是大连，你们家住在细管胡同三号。

母亲说，这孩子人来疯，动辄就犯浑，跟死了的老五一个德行。

小连说，丫丫长得像三表姐。

小连说的是在德胜门城根儿被活埋了的那个，母亲说的是被





父亲赶出家门在后门桥冻饿而死的那个,都是死鬼,就是说我像死鬼,这更让我不快。我看得出,小连对我的亲切和笑意都是装出来的,假模假式。小孩子一般都有这种直觉,就像狗,谁对它是真好假好,它不是凭眼光,是凭感觉。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小连没什么好印象。

在这里恕我将小连的正式名字隐去,父亲生前反复强调过,不要提及和小连的亲戚关系,免得给人家造成被动。我说,这样伟大的亲戚有跟没有一个样。

应该说这个家里那天拿得最稳的是父亲。父亲不愧是有“镇国将军”称号的,悠静静地坐在书房里等着外甥的拜见,手下一幅《鹌鹑石榴》的工笔连停也没有停。按常规,小连这样的官来了,父亲会安排在客厅见面,但小连是父亲姐姐的儿子,在客厅见面就显得太郑重太见外,毕竟是小辈,犯不着那样大动干戈。甥舅在书房相见随和又不失身份,挺好。

小连一掀门帘进了书房,伟大的官员把大衣一扔,没忘了给我父亲请安。这让我看着有些怪诞,我想他再官大,在叶家也是外甥,这怕是改变不了的。

“半世总为天外客,一家今是故乡人。”小连在书房里跟父亲谈了些什么我无从得知,连母亲也很知趣地回避了。其间母亲进去送了一次茶,出来对我说两个人都在掉眼泪。大官还会哭,父亲还会哭,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官面上的小连从来都是正面须生的形象,冠冕堂皇,不苟言笑。有一次我和父亲参加政协的新春联欢会,在会上见到了小连,他扫了我一眼,竟然不认识一般地从我跟前走过去了。那张脸,那做派,是绝对的正儿八经。但只有我知道,在正儿八经的背后,他在父亲的书房里偷偷哭过。这个秘密我没对谁说过,说出来怕人家不信,闹不好就跟说我们家有马车似的。

父亲是政协委员,有人说这与小连绝对有关系,但父亲否认